

绪 论

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中共历史学和邓小平这一个个体身份的特殊性。为了科学地解读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有必要对中共历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和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的贡献，在总体上作出初步的回答。这是本书的基础。

一、中共历史与中共历史学

中共历史和中共历史学，是本书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中共历史的存在是中共历史学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共历史学的出现则使中共历史进入人们的主观视域，并使其丰富的内容得以展现。

（一）什么是中共历史

中共历史与中共历史学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历史不待历史学家的发现与解释而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默默地行进。作为过往社会的客观过程，即人类社会客观过程已经消失的部分，历史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客观性，二是过往性。

中共历史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解，中共历史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已经过去了的创立、发展、壮大以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过程，其属性也应该有二，即客观性和过往性。所谓“客观性”是指：其一，中共历史

本身是客观存在着的，它独立于认识者、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之外，无论你承认与否，也不论你认识与否，它都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其二，中共历史是以往经历过的客观过程，它有其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其三，中共历史及其运动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只是其被认识的途径、特点、方法等与其他学科有差别罢了。一般说来，要人们承认只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中共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不会太难，但要人们承认并理解中共历史事物和现象的原因、性质、特质、因果关系、运动规律等也具有客观性就比较困难。中共历史是由若干个个体组成的政党自身创造的，看上去它不可避免地充满着人的主观因素。恩格斯曾指出：“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①为什么作为人们按各自目的、意图进行活动的结果的社会历史具有客观性？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历史自身的特点。我们知道，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历史的，故而，单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尽管是有目的、有意图的，但每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受到他人目的和意图制约的。这种相互制约、相互抵消，就使得作为每个人共同活动结果的历史过程出现不以哪一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局。另一方面，人虽然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是历史创造的产物，人的活动的历史前提客观地制约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这种历史制约机制就使得人们创造的历史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中共历史也是如此，虽然它是由若干个党员组成的政党这一政治组织创造的，但它毕竟是丰富的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具有人类历史客观实在性的品质。同样，对中共历史过往性的理解也可以从人们对人类历史品质的发现中找到答案。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并不是当下的，而是一种已逝的客观实在。因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2页。

要弄清历史的过往性特征，就有必要对历史与现实关系作一定的分析。人们常说，历史是稳定凝结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已经完成的过去，现实是正在进行还没有结束的，历史是稳定不变的，现实是发展变化的。简言之，历史是一种过往的、已逝的、稳定的东西，现实则不具备这一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历史即是指那些已逝的、过往的和稳定的纵向时间进程。

（二）中共历史事实的基本规定

从理论上说，中共历史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它构成了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中共历史既然作为一种已逝的历史现象，不可重复，也不能逆转，因而中共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就不可能有直接的接触。人们对中共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回溯、复原历史来进行的。其特点是：首先，作为中共历史认识的客体，已不再是具有特定的本体论状态的纯粹的历史实在，而是通过文字、资料等所再现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是一种已经积淀着主体选择和主观评价的历史构造，即我们所说的中共历史事实。其次，作为中共历史认识的主体，虽然有一部分人亲身参与了中共历史的创造，是过去历史的经历者和创造者，但研究中共历史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共历史 80 余年中的相当部分，已不可能是过去历史的实践主体。所以，也就不可能使中共历史认识与实践活动在同一主体基础上结成反馈关系。中共历史的认识主体既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实验研究认识对象和验证自身认识的真伪，也缺乏其他社会科学所具备的直接社会实践的检验手段，同时还面临着由于历史材料不足乃至空白所造成的种种困境和遗憾。在对中共历史认识的过程中，认识主体较之于其他认识主体必然具有更大的主观参与性。这样，人们的历史认识虽然在原则上无疑应该服从于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和法则，但存在着较之于其他认识形式更为尖锐的一系列认识论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共历史事实”概念的规范和概括。

中共历史事实作为中共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共历史学的硬核和基本内容。尊重历史事实，准确地描写和再现历史事实，是历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20 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理论家 E·迈耶尔曾明确地指出：“一个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曾经在某个地方发生过的事实。如果历史学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没有充分认识事实的材料，各种孤立的、个别的事实，那么它的整个著作就缺乏根基。”^①迈耶尔的这一认识与人类认识的一般法则是一致的，是任何一个研究中共历史的人都可能自发拥有的朴素信念。但问题在于，具有不同认识倾向的历史认识主体，对于中共历史事实的诠释和理解往往又是不同的。由此，又必然引出中共历史学家必须慎重解决的问题：什么是中共历史事实？

来自拉丁词“factum”的“事实”一词，可以是指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包括实际的事物、现象、事件等，也可以是指经过验证的、确切的现成的资料或数据，与“证据”、“证明”同义，内含着真理性。虽然，事实一词存在着多义性，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因为事实概念的任何意义，都内在地蕴含着一个基本规定，即作为其统一性客观存在。把事实概念引进中共历史认识领域，事实就具体化为中共历史事实，同样，它 also 具有多重含义，并可作多层次的解释。

第一，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共历史事实，表征着客观实在的历史过程和事件。人的认识就其一般而言，只能是客观实在的反映和模写，并且只能以被反映和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历史认识也是如此。处于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中共历史事实，必有认识之前的独立存在，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是中共历史认识赖以发生和实现的坚实基础。否认中共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中共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任何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尽管中共历史认识主体不能直接面对客观实在的历史过程和事件，不能不利用前人撰写的关于各种中共历史事件及过程的论析、著

^① E·迈耶尔：《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俄文版，1991 年版，第 47 页。

述等，但这一切历史文献、资料不论其带有多少主观因素，在基本内容上必须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只有这样，才具有史学价值。

第二，作为认识论意义的中共历史事实，是指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文献、资料、传说等，构成中共历史认识的直接对象。这种历史事实在其纳入历史认识主体视野之前，不仅已经积淀了以往历史认识主体的选择和评价，而且在被认识的过程中，会再次接受主体的规定，从而必然与历史认识主体相互依赖、互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历史事实作为认识论概念已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而是认识主体通过选择、整合、评价等再创造出来的一种构造。没有这种构造，历史实在虽然也曾客观存在过，但不可能为人所知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共历史事实已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实际上，中共历史事实在接受认识主体选择和评价的过程中，从来不会失去自身固有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性始终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始终制约着认识主体主观性的伸张。中共历史认识主体对于历史事实的选择、取舍、解释必须以历史事实内含的客观实在性为尺度，这是中共历史认识主体达到对历史的真理性认识的根本保证。

第三，作为知识形态意义上中共历史事实，是指依据文献、资料等重构历史实在的科学映象和知识体系。中共历史事实在历史主体的认知过程中往往被转化成知识形态，也就是中共历史学的客观内容。中共历史学作为人们研究中共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是历史认识主体，特别是中共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以历史实在为基础的历史认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说得明白点，就是历史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中共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基础之上的。中共历史学作为中共历史和历史事实的逻辑再现，在整体和基本内容上都应与中共历史和历史事实相符合。中共历史学的客观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主观范围内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但是它必须依赖于中共历史和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三）中共历史学

何谓中共历史学？所谓“学”，就是独立的学科。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而中共历史学则是研究这一过程的学科。本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属于历史学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单独立“学”？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执政党的历史而就有这样的特权，也不是我们这些研究中共历史的人要求拥有这样的特权，它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要研究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的哪个层面，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绝对不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过程特别曲折复杂，不单独立“学”，不形成相当规模的研究体系，无法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史全过程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但概括地说不外两大类：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对这两大类内容进行研究的中共历史学，应该构成怎样一个研究体系呢？我们以为它在大的方面，是与历史学一致的，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内容，它都应该有，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大致说来，有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通史类。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党自身建设的历史。这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考察和研究，作出历史全过程、全方位的叙述和分析。它可以使人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全貌。这方面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中共历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深浅。研究中共历史的人一直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和正在撰写的第 2 卷和第 3 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以往党校、军校、高校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教材，如何沁

等编写的《中共党史讲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稿》（4册）等，也属于此类著作。

第二，断代史类。即把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按时间顺序分成阶段进行研究。这方面研究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延续时间长，包含内容多，但不同阶段又有特殊性。分成阶段，有利于研究。从大阶段上说，可以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阶段、社会主义新时期阶段。这三个阶段下边，又可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如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在中共历史研究体系中，这类研究占有重要位置，是最基本的部分。成果也较突出，如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黄修荣著的《国民革命史》何理著的《抗日战争史》，王学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等。

第三，专门史类。即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理论诸领域的活动，以史的发展为线索分别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而且有的领域的活动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军事领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领域，没有长期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又如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领域，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艰苦的工作，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再如理论领域，无论革命阶段还是建设阶段，都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灵魂，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发展。可见，要使中共历史研究深入，不分别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活动是不行的。在中共历史研究中，专门史类占有很大分量，也是中共历史研究体系的基本部分。如周尚文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金春明、陈登才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宋春、刘志超主编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王邦佐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两

党关系通史》，范小方等著的《中共谈判史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等，均属此类。

第四，地区史类。即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按地区以史的发展为线索分别进行研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都是分地区进行的，或一省一市一县，或几省几市几县。由于各地区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不同，无论是革命阶段还是建设阶段，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有快有慢，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因此，地区史是中共历史研究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吴家林、谢荫明著的《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盖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周子东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蒋伯英著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以及各地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大量地方党史等，都是此类著作。

第五，行业史类。即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按行业系统以史的发展为线索分别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各个阶段，也通过行业系统进行，如铁路系统、纺织系统、学校系统。各行业党的活动有自身的特点，也是深入进行中共历史研究的一个侧面。如张大中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萧超然著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李代耕编著的《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略》等，均属此类。

第六，人物志类。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党内外各行各业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分别进行研究。人物研究历来是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影响的人物甚多，故而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占有的分量也相当大。这方面已有的成果甚多，如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章学新主编的《任弼时传》，房维中等主编的《李富春传》，爱泼斯坦著的《宋庆龄传》，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的《江泽民传》，任建树、唐宝林著的《陈独秀传》，朱志敏著的《李大钊传》，陈铁健著的《瞿秋白传》，宋镜明著的《李

达传记》等。

第七，研究性回忆录。一般回忆是资料性的，不是研究成果，当然不包含于研究体系之中，但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却有一些回忆是在研究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研究性的回忆成果，不但有回忆者提供的亲身经历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回忆者对历史的见解，也有协助者研究的成果。它在中共历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确实不可缺少。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李维汉著的《回忆与研究》以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就是这类著作。

第八，基础理论类。即中共历史史料学、中共历史学史、中共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等。研究作为历史学科的中共历史，当然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仍需要一种中介理论，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历史研究实际结合起来。帮助研究者如何掌握和运用史料的史料学，总结研究中的经验教训以提高研究水平的史学史，也都是中共历史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此类著作有张静如、唐曼珍的《中共党史学史》，张静如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张注洪的《中国革命史史料学》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周一平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等^①。

中共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呢？这是本部分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毋庸置疑，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历史学界的努力，中共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对中共历史学科学性的怀疑已越来越少，但这种疑问仍是有的。形成这样的局面，与人们对中共历史学的误解有关，也与历史上中共历史学有一段时间背离了科学性的事实有关，还与当下的极少数人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违背历史主义、掺杂着伪科学主义的做法有关。总之，原因很多。这种疑问若不消除，中共历史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参见张静如、王先俊：《中共党史学与20世纪》，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既然中共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那么在回答中共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之前，先来看看历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前后持续了 100 多年之久。有人认为，历史学并非科学而是艺术，比如 19 世纪英国学者马考莱（1800—1859 年）强调，写历史的目的就是为现实提供借鉴。历史本身只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任何人都可以从历史资料库里抽取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与马考莱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弗劳德也指出，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因为所谓历史事实不过是“孩子们的一匣子字母片，我们爱把它们拼成什么字就能拼成什么字”^①。在他看来，历史就是戏剧，是为了教育今人，鉴往知来。

19 世纪，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先后崛起于欧洲。它们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宣称史学不是一门艺术。客观主义史学代表兰克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所谓“客观主义”，用兰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实直书，在书中“消灭自我”。“科学方法”即对史料批判的方法，其要义是：史学研究必须搜集大量原始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鉴别、辨析，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务必使史学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兰克所主张的那种“排除自我”而“客观地”叙述历史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兰克史学中只有史料批判的方法具有科学的价值。

与客观主义史学相比，实证主义史学的科学主张又前进了一步。实证主义史学代表法国的泰恩（1828—1893 年）和英国的巴克尔（1821—1861 年）认为，历史学与心理学、动物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发现一般规律，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泰恩和巴克尔等人的史学实践加速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但此后，“科学的史学”又遭到了相对主义史学以及克罗齐等从艺术角度对历史学科学性质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3 页。

的诘难，并由此引发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艺术之争。

在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作出了正确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肯定历史学科学性的基础上，承认艺术对历史学的补充作用。它认为，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科学，同时历史学也离不开艺术，史学的内容是科学的，其表现形式是讲求表达艺术的。只有认识了史学的上述特性，我们才能在史学实践中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表现形式的艺术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写出既具有科学价值又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的佳作。

在近代中国，西方有关史学思潮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并且形成了实证主义、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史学思潮争奇斗艳的局面。如何建立“科学的史学”成为三大史学思潮躁动的焦点。中国的实证主义史学强调科学的史学就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史学的任务就是史料的搜集、校勘、辨伪、整理和考订，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相对主义史学反对实证主义史学的上述观点，认为决不能把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但他们大都认为历史学仍不失为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科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坚信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主张理论和史料的结合，主张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实证主义史学在20世纪30年代前独霸史坛；30年代以后，尤其是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为主导潮流；相对主义史学在三四十年代曾兴盛一时，但在整个史学界始终未占统治地位。从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的主张看，尽管对什么是“科学的史学”以及如何建立“科学的史学”认识并不一致，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则是它们的共识。中共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也能成为一门科学。具体地说：

第一，它把中共历史视为客观自然的过程，是不以任何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就使得中共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了客观实在性。而任何科学得以成立的首要条件便是其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第二，中共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历史学还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包括政党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并进而创立了一系列反映历史现象真实联系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论体系，这给中共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武器。

当然，中共历史学应该成为，也必然能成为一门科学，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就是一门科学。把必然性、可能性变成现实，并不断增强其科学性和学术化，还要靠中共历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二、中共历史学的发展历程

对中共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也就是对中共历史研究自身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属于中共历史学史的范畴。中共历史学的产生差不多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同步，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期间，中共历史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之”字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留有深刻的教训。总的进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中共历史学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始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至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关于中共历史研究始于何时、其标志性的成果是什么，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这是第一本中共历史学史著作）认为，最早研究中共历史的文章是 1924 年 1 月陈公博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周一平撰写的《中共党史学史》认为，中共历史研究在中共正式诞生以前，在筹备过程中就产生了，最早研究中共历史的文字应是瞿秋白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 年 1 月）、《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1921 年 6 月），张太雷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

参见张静如、王先俊：《中共党史学与 20 世纪》，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告》（1921年6月），而不是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周著之所以有上述认识，原因在于它对中共历史研究内涵的界定。周著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础，一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这些内容的研究当属中共历史研究的范畴^①。瞿秋白、张太雷的上述文章也确是研究上述内容的，以此作为中共历史学萌芽的起点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运用，陆续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中共历史报告、著作及人物传记。主要有：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4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和《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1927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30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1930年），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史》（1930年），华岗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以及1928年党的六大期间编写的《烈士传记资料》等。

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能比较客观地叙述党的发展历程，并较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从中国产业的状况、罢工运动、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形成等广阔的视野，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批判了中共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同时强调中共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并对中共历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作了初步的阐释，在史学方法上提出用历史的方法，即历史分析方法和实事求是方法研究中共历史。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被后来的中共历史研究所继承和发扬。在具体方法上，也各有所长。蔡和森、李立三多以个人的经历为

参见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论证的佐证，直观而真实；瞿秋白则按顺序分门别类地引用党的文件、共产国际的指示等，采取了按党的会议与革命活动的发展双线叙述的方法，并注意到活动与活动、会议与会议间的相互递嬗。在文字表述上也颇具个性和风采，语言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

中共历史学所以能在这一时期萌生并有所发展，不仅是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需要深入研究，进行总结，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在中国诞生，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五四时期，李大钊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唯物史观引进史学领域，他撰写的《史学要论》（1924年）在历史观、历史理论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书分为6个部分：1. 什么是历史；2. 什么是历史学；3. 历史学的系统；4. 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5. 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6.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这种按照史学理论自身要求而作的构架，以及书中对史学对象、功能、任务、目的、价值、方法等所作的分析，都表明它无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专著，它的出版无疑给中共历史研究以有力的方法论指导。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在这个时候，中共历史学还很很不成熟：研究中共历史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十分明确，中共历史研究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也是初步的，还没有形成中共历史研究自身的历史理论，往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判断和评价史实的标准，因而很难对党自身的发展规律有较深刻的认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未必科学，加之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缺乏必要的资料，有些论著是仅凭个人记忆写出来的，因此，论证不够严谨，叙述方法比较单一。这些都是中共历史学萌芽时期难以避免的。

（二）中共历史学初建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从红军长征结束到新中国成立。

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由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中共历史研究提

供了借鉴，也由于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了指导和依据，同时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党中央还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体学习和研究中共历史，这样就使这一时期的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了辉煌成果。

第一，对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历史主义作为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之一，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这是中共历史学史上第一篇专门探讨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在中共历史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其贡献，一是阐明了中共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认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① 以史为鉴，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和任务。二是论述了中共历史研究的对象，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② 三是分析了中共历史研究的观点，强调“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③ 四是总结了中共历史研究的方法，文章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407页。

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①五是探讨了中共历史的分期。文章将中共历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大革命准备阶段（1911—1924）、大革命时期（1925—1927）、内战时期（1928—1937）、抗日时期（1937—1945）。《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于中共历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共历史研究有了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成果既是中共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为中共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第二，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一批从各个侧面、各个时期研究中共历史的论著。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共的社科研究机构、学校教学机构在延安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中央研究院（前身是马列主义学院）、抗大、陕北公学、华北联大等历史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有了一定规模的建设，中共历史研究的学者队伍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如何干之、胡华等。学者队伍的扩大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使一大批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何干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陈伯达的《关于十年内战》等。这些著作开始把党的发展过程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发展规律，并对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评价。

上述论著主要是个人的成果。另一重要成果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研究中共历史的经典之作，在中共历史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一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二是全面清算了党内的错误路线，澄清了党内历史是非；三是深刻总结了20多年来的历史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经验教训。其次是对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涉及到的重要会议和事件包括八七会议、中共六大、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等。对很多会议和事件的评价，至今看来仍然是基本正确的。《决议》的通过以及《决议》的基本精神，对推动中共历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第三，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取得重要成果。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文集，收录了 1922 年至 1941 年间党的文件、领导人的文章及电报稿等各种历史文献 750 多篇，约 400 万字，是难得的史料工具书，为中共历史学的基本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编纂方法也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共历史学健康发展的问題。主要是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模式的影响，过分突出党内路线斗争，把路线斗争当作中共历史发展的主线加以描述，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有绝对化的倾向。这两个方面在后来的中共历史研究中一度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影响了中共历史学的发展。

（三）中共历史学基本成型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 17 年。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高潮，尤其是 1951 年至 1960 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相继出版，对中共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的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理论成果，它对中共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是全方位的，既有历史观的指导，也有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此后，各种研究中共历史的著作和教科书，不仅在分期上采用了《毛泽东选集》的分期法，而且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介绍上，也大都采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提法。这期间，教育部规定在高等